

上海副食品供应的制约因素和趋势

陈黎

上海是一个特大的城市，全市居住1260多万人口和200多万流动人员。全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丰歉直接影响到上海的副食品市场。因此，研究上海副食品市场的供应趋势，必须要分析全国粮食和副食品生产的状况，以及对上海副食品供应的影响。

一、粮食生产的回顾

近10年粮食生产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4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农产品价格改革的共同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了少有的连续丰收景象。1978年~1984年，粮食总产由30480万吨提高到40731万吨，增长33.63%，年均增长5.6%。尤其是1982~1984年，粮食每年平均增长273.5亿公斤，商品粮平均每年增长210亿公斤，大大超过粮食年消费增长100~125亿公斤的幅度，加上粮食进口大于出口，粮食市场出现了少有的供大于求的现象。因粮食价格购销倒挂，国家购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而且粮食的仓容不足，1984年国家露天存放的粮食已达300亿斤。一个长期被粮食紧缺所困扰的国家，第一次因粮食供大于求而烦恼。

第二个阶段以1985年粮食大幅度减产为始点。当人们还未能妥善解决粮食丰收所带来的问题，就出现了1985年粮食生产骤然下降。产量比上年减少2820万吨，下降6.92%。又因国家收购价降低，农民不愿卖粮，不少地方政府是奇货可居，屯积粮食，个别地方甚至封锁粮食流通，出现了粮食供应人为紧张的局面。这种情况迅速蔓延到城市，引起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1986年很多大城市重又实行部分副食品凭票限量供应，城市副食品供应办法出现了回归现象。

二、消费的变化

前几年粮食较为富裕，促进了副食品生产的发展，使城市居民和农民主食和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以1985年为界，在1985年以前，全国职工家庭人均粮食消费曲线呈上升状，1985年后则出现下降趋势。但肉、禽、蛋的消费曲线却稳步上升。1987年全国人均肉、禽、蛋、水产品的消费量28.79公斤，其中猪肉14.54公斤，牛羊肉1.44公斤，家禽1.71公斤，鲜蛋5.56公斤，水产品5.54公斤，总人均消费量比1978年增111.5%，各品种分别比1978年增加了0.89倍、2.89倍、1.82倍和0.58倍。主食与副食品消费的变化显示城市居民的消费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公认的判断人们消费水平的标准。1978年全国农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处于绝对贫困阶段。1957~1984年全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7~58%上下徘徊。1986年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为52.43%，农民家庭为56.3%。这说明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

分析职工家庭人均消费量，我们可发现消费是刚性的，即消费数量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

可逆转的。因粮食丰收人们增加了副食品消费，但是1985年粮食减产后，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人们并没有因粮食的减产而减少副食品消费，仅仅是降低了副食品消费增长的速度。在1980~1985年的6年中，全国人均年增加猪肉消费量0.6公斤、禽0.13公斤、蛋0.9公斤。在1985~1987年，每年人均增加猪肉消费量0.2公斤、禽0.05公斤、蛋0.19公斤，分别比前6年的增幅下降0.4公斤、0.08公斤、0.1公斤。1985年后，粮食产量减少、徘徊，而消费虽有减速，但绝对量仍在增长。粮食生产与消费增长刚性不同步的矛盾，必然使市场供应紧张。

三、不容乐观的条件与趋势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11亿人口，14.4亿亩耕地，其中三分之二是中低产田。面对这两个基本事实，任何过于乐观的情绪都是没有根据的，更何况两者呈逆向发展，人口在增加，耕超的地在减过去10年中，全国耕地减少5500万亩，人口增加突破1亿。在今后的若干年中，粮食生产的波动是难免的。就目前的生产关系而言，我们已不具有象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种以调整生产关系而释放出巨大生产能量的有效办法。今后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将依靠增加对农业投入，依靠科学进步，即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今后三、五年内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可能性很小。

副食品由粮食转化而来，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下降与消费不可逆转的上升，决定了全国副食品市场的严峻趋势。1982年以前，我国自产粮食人均占有量约600多斤的水平。1983年人均粮食达到753.7斤，1984年为784斤，是人均占有粮食的最高水平。此时，人均粮食未占有量过直接消费粮食的需要，有利于将粮食转化为副食品，所以1985年的人均副食品消费量有较大幅度提高。1985年后人均占有粮食下降，1988年为719斤，比1984年减少65斤，而人均消费副食品用粮却增加。据有关方面估计，2000年我国粮食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如按现有人口加前五年出生率，届时人口将是12.8亿，人均占有粮食780斤，仅维持在1984年的生产水平，也就是目前的实际消费水平。在今后若干年内，耕地将进一步减少，人口还在年年增加，这意味着新增产的粮食只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人均占有粮食难以提高。到2000年，农业生产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粮食用于提高居民的副食品消费。同时，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国家不可能采用日本那样的办法，依靠进口解决居民的副食品消费。综上所述，今后三、五年里全国粮食供求、副食品供求关系绝对不容乐观，而是相当严峻的。一旦出现面积较大的自然灾害，全国的粮食、副食品供应，尤其是城市的供应必将会出现紧张。1987年全国人均消费粮食782斤，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1987年人均消费粮食已达1014斤，今后能增加的副食品有限，居民改善生活的要求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四、影响副食品生产的因素

(1) 饲料短缺。众所周知，副食品是由饲料转化而来，饲料供应的情况主要取决于粮食生产。而近几年粮食生产出现徘徊，粮食市场紧张，今后几年内粮食也不会有大幅度的增产，进口饲料又受到外汇的限制，因此，近期内饲料不足将是今后副食品生产中最大的难题。

(2) 价格变化与自食行为。农民不为市场生产，消费却受市场价格的影响。以生猪为例，料肉比是生猪生产的临界价格，当价格高于临界点，农户会缩小自食比重，扩大上市量；反之，价格低于临界点，农户会增加自食量，缩小上市量。由于农户基数大，对价格作出同

步反应，市场将产生很大震动。假定1.9亿农户，每户多吃或少吃0.3头生猪，市场将增加或减少5500万头生猪的上市量。

(3) 收入增加对自给性的影响。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78~1986年,我国农村劳力的一般工价由1.13元增至2.43元,增加了115%。1978年农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一般而言:食物在收入中的百分比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这是指收入与消费变化的全过程。分阶段看,在绝对贫困和勉强度日两个时期,收入的增长与消费的增长成正比例,小康水平即恩格尔系数40~50%是收入与消费变化的转折点,到了富裕与最富裕时期食物在收入中的比重才随收入增长而下降。当我国农民处于贫困时期,他们增加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食物消费。近几年来,农民副食品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增加了全国副食品供应的紧张。

(4) 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全国副食品生产从形式上看存在三个层次:家庭散养、专业户和大饲养场。目前从实际生产能力看,家庭散养占绝对优势。以生猪为例,家庭散养的产量约占生猪产量的95~97%,而专业户和大猪场约占3~5%。家庭散养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全国的市场供应。

我国约1.9亿家农户,几乎家家都有家庭副业,表现出高度的分散性。农民副食品的自食比重一般为50~60%,表现出高度的自给性。家庭散养的分散性和自给性决定了副食品市场的不稳定。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很难保证市场的稳定供应。

(5) 财政不堪重负。副食品购销价格倒挂,差额由财政补贴的办法从一开始就隐藏着一种危机,即生产越发展,消费越提高,财政补贴额越大。政府行为与生产者利益、消费者利益相悖。利益的不协调终会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农民不交粮和猪、“卖粮难”、“卖猪难”,正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近几年上海地方财政用于食品供应的补贴不断增加,1988年在粮、肉、禽、蛋、菜上的明贴暗补共11.84亿元,比1987年增长16.5%,占地方财政支出的17.32%。据有关方面估计,1989年各类价格补贴超过20亿元。当补贴增长的幅度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即意味着消费增长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此国家总是力图减轻补贴的负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府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改政策和采取压低收购价格的办法去减轻财政负担。这种做法所产生的“谷贱伤农”的效应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一轮又一轮生产波动。当副食品生产由财政包下来时,有多少钱就生产多少副食品,生产多了财政贴不起,可见,副食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受财政能力的制约。

我们正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仍就贵买贱卖地供应副食品,结果是财政包袱越来越重;一是改革购销制度,引入市场机制,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风险。前者以牺牲经济发展保住“菜篮子”,代价太大;后者有市场波动的风险,影响社会安定。

五、对策

(1) 以适当增加郊区生产的自给程度保供应。依靠指令性计划保证上海副食品供应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市场机制尚未成形,如何满足上海居民的食品需求就成为一个敏感而令人担心的问题。当我们不得已决定以自给保上海副食品市场供应时,必须明白,这不是一种最佳的经济选择,为此,我们将付出代价。然而,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时期,我们又不得不借助于自给的手段来维持市场乃至社会的稳定。

由于全国粮食生产形势严峻，以小生产方式为主的全国粮食生产极不稳定，为保证上海城市副食品供应的稳定与均衡，在近期内副食品供应主要立足于郊区生产。“八五”时期，假定价格和政策没有重大问题，依靠郊区副食品生产能力，能保证上海市副食品的正常供应，并能保证市场的相对稳定。上海全年销售猪肉约28万吨、家禽7000万只、鲜蛋11万吨。目前本市自给量猪肉约8万吨、家禽5500万只、鲜蛋9万吨，自给率分别为约30%、80%和82%。根据“菜篮子工程”的设计，1990年基地将增加新的生产能力：肉猪103万头，肉鸡683万只，蛋鸡356万只。如果“菜篮子工程”能如期实现，上海禽蛋的消费量基本上可以自给，猪肉的自给量可达40%，到那时上海副食品生产可以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城市副食品供应主要立足郊区的目标可以实现。

上海在力争提高副食品自给率的同时，仍要与外省保持一定的贸易关系，一是为了调剂品种，二是为了互补丰歉。近年内粮食生产没有大的起色，全国的副食品生产也难以摆脱紧张的局面。为保证城市猪肉和海产品的供应，有关部门可以用部分紧俏工业品串换市场需要的副食品。

(2) 以进口饲料保供应。上海副食品饲料缺口近30亿斤，在全国粮食生产徘徊的情况下，要在不稳定的粮食市场筹集全部饲料难度很大。因为上海饲料的需求量大，如果完全依赖国内粮食，将对原来就求大于供的市场增加压力，对国内粮食市场冲击很大，会引起粮价和饲料价格提高，使副食品生产成本上升。结果不是市民增加支出，就是财政增加补贴。笔者认为，解决饲料的办法：一是减少郊区饲养量，增加外采数量；二是进口饲料。由于全国副食品不富裕而又不稳定，加上区域利益引起的种种矛盾，增加外采副食品困难也很大。目前较为可行的是进口饲料。国家每年要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国际市场上饲料价格比较便宜，我们可以直接进口一部分饲料。上海作为港口城市，进口饲料十分方便，还可以减少国内运输的压力。这是较为经济和方便地解决上海饲料问题的办法。

(3) 以发展规模经营来保供应。改变饲养业，特别是改变生猪生产的传统方式。目前，郊区肉猪上市量中60%以上是千家万户的家庭副业，由于经济效益低，又因农民收入的提高，养猪增加收入的动力机制已基本消失。现在是依靠行政干预的办法维持生猪生产，农民把养猪作为一项上级指派的任务去完成。改变这种状况，完全靠提高价格，国家难以承受。主要的出路是国家、集体增加投入，建立国营、集体、专业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基地，发展规模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给传统的养殖业以新的活力。

(4) 正确引导消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经济水平低，居民消费水平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不断大幅度的提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将居民消费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鉴于营养学家提供的标准，每人每日需要热量2700大卡，蛋白质80克，脂肪66克，上海居民目前的实际消费水平已接近或超过了营养标准。所以，在副食品消费方面，不要盲目与发达国家攀比，要充分运用宣传媒介，以实例教育人民，了解过食、滥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危害，逐步做到科学用膳，营养平衡，在人民中形成以节制、节约为荣，滥食、浪费为耻的社会风气。